

16~13

南召文史资料

第七辑

教育专辑

92

政协河南省南召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召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召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二月出版

封面题字：王文元

封面设计：张中飞 王全兴

南召文史资料

第七辑

豫内准印通字宛新出发第026号

南召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100

前 言

《南召文史资料》第七期（教育专辑），遵照文史资料的工作方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征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立后三个历史时期南召教育的发展、改革概况的资料，介绍了几所典型学校的校史及教育界的几位名人事迹。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几经研讨，反复考订，如今付梓面世了。

本专辑在征集过程中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同时，还受到县内外、省内外直至台省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广大同仁们的热情赞助并为之撰稿。诸如年近八旬的革命老前辈、原西藏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党及辰同志，接到稿约，欣然惠赐《忆南召现代中学》的文章，原南召完中校长张纪功同志，应邀撰稿，抱病伏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回忆录》，召籍台胞陈修武、刘克明二位先生特寄回可贵资料，洋溢着爱国思乡的无限深情。全书文稿，体现了“以史为鉴，以文会友，振兴中华，共同奋斗”的宗旨。

本专辑另具特色之处是收编了召籍——中顾委委员、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同志、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彭清源同志、当代科学家王永民同志发给有关同志的函件，恰与有关史料混然一体，交相映辉。

本专辑在审编过程中，得到县教委领导、教育志编辑室、南召一中、县志办编委以及教育界老干部、县直干部中知情教育史的众多同志的热情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辑资料，征集的期限达百年之久，加之我们视野有限，力难从心，差错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 编者 • 1991年12月18日

目 录

简述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南召教育.....	教育志编辑室 (1)
南召儒学的兴废.....	张绍欣整理 (4)
忆清末、民初南召县教育及人文.....	刘克明 (8)
南召县早期女子小学.....	李宾甫 (15)
回忆南召现代中学.....	党及辰 (17)
南召现代中学的无私奉献者.....	李冠群 (24)
袁宝华同志关于现代中学的一封信.....	(29)
回忆抗战时期刘村镇中、小学儿童团.....	王运祥 (30)
凤麓小学始末.....	教育志编辑室整理 (35)
李青店女子小学.....	李汉松 (38)
我对南召县教育的视察.....	宋 泽 (40)
南都中学在刘村.....	陈修武 (48)
记彭和卿先生二、三事.....	李耀林 (62)
彭清源同志关于南都中学的一封信.....	(67)
我任南召县教育局长时工作片断回忆.....	段雅亭 (69)
民国时期南召县城的初级中学.....	刘涛、李宾甫 (74)
回忆县中.....	罗兴武 (77)
解放前县立的几所完全小学校.....	张绍欣整理 (81)
南召简师附小开设童子军课记实.....	李冠群 (87)
李宾甫同志片断回忆.....	(89)
回忆南召县建国初期的教育工作.....	田泽霖 (93)
建国初期南召教育由恢复到发展的概况.....	刘亚忠 (101)

南召教育的变革（1949—1956年）	张中飞	(106)
解放初期的师资培训……寇金昌口述	陈君逸整理	(111)
解放初期南河店举办的师训班	韩明功	(114)
办学、治校和校风		
——南召一中初设高中的十年间散记……王国林		(116)
三十七年体育教学工作的回顾……王元堂		(122)
一九五六年南召县小学语文教学始用普通话……史天立		(128)
南召县星期日教师进修学校	史天立	(129)
南召县教研室初建时的工作回忆……李之		(132)
五十年代的南召县教育工会	聂冰	(135)
忆建国初期南召县的小学一次规划……陈君逸		(139)
历经沧桑的云阳回民小学……贾树森	陈中亮整理	(142)
解放战争时期的联防村小学	韩明功	(146)
回忆我在板山坪完小的工作……聂冰		(148)
南召短师甲班的宣传队	王九世	(152)
丹霞寺乡干扫盲班的回忆……王丰三	刘效典	(157)
五十年代初我在周湾乡搞扫盲教育……马中尚		(162)
云阳红旗中学……赫景昌张荣馥回忆	李宾甫整理	(165)
乔端农业中学……寇金昌		(169)
严谨治校的张纪功校长……刘亚忠	张中飞	(173)
附北京王码电脑公司教授王永民同志的一封信		(181)
来光远老师在南召一中执教简述……张中飞		(183)
从红军战士到学校校长——李正鼎……张中飞整理		(189)
记南召二中校长刘涛二、三事……李宾甫		(195)
征稿启事……		(199)

简述晚清、民国和 新中国建立后的南召教育

教育志编辑室

南召教育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变革，且具有浓重的山区特色。在近代、现代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了由封建性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演变；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改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以特有的形式反映出经济基础的变化状态，同时，也反映了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清代，南召教育是沿袭隋唐科举制以来的封建教育。地方上开设“私塾”，县设“儒学”。私塾分“专馆”、“散馆”，其教学内容，均课“四书”、“五经”，宣讲“孔孟之道”，借以维系封建制度。县设“儒学”是县教育行政机构，也是对地方生员训育的场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教育制度亦随之而演变。南召教育的演变，始于“戊戌变法”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就县城西街试院创办“南召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就县城孔庙（儒学）建立“南召官立模范小学堂”，同时，又创建“南召初级蚕桑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年），南召小学堂兴办到24所，其教学内容除设“讲经”、“读经”外，增加了“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特性。

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颁布教育宗旨及有关法规，对清末的教育作了一些重要改革。当时，南召小学堂一律改为小学校，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开设“合乎民主共和国教育宗旨”的课程。“五四”运动，对南召教育影响颇大，据《大中华河南地理志》载：1920年10月，南召县立案学校25所，学生1000余人，较之清宣统年间学堂学生540名增长一倍。民国24年（1935年）本县首建初级中学一所。抗日战争时期，有省立二小、五小、八小、九小、实验民众学校和南阳实验小学、南都中学迁入县境，在客籍学校的影响下，本县先后又创办了南河中学、李青店青年中学。特别是南召地下党于1938年至1942年创办的“现代中学”，实施了“抗大”的办学方针，采取了有关教学内容，直接为革命斗争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宝贵人才。

1947年11月，南召解放，县委和县政府及时接管县境原有学校。1948年春，动员组织教师队伍，开办了城关、留山小店、云阳、曹店、南河店、白土岗、钟店等处的小学。

新中国建立后，本县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工作方针，随着土改，反霸斗争的胜利，南召教育遵照中央指示，培训了新的师资，废止旧教材，改革旧教法，进行了历史性的革命。从1949年至1952年秋建立“南召县初级中学”和“南召县中云阳分校”。小学发展到288所，645班，在校学生29620人，教师800人，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小学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规模。

1956年秋，县创办高级中学，招生2班，学生100名，附设在“南召县初级中学”内，“南召县中”遂易名为“南召县完全中学”。是年县增设石门、马市坪两所初中，各招生

100名。总计此时县境中学达4所，在校学生1750人；小学发展到199所、726班，学生27667人。

1958—1960年，本县掀起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中、小学教师、学生投入“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劳动中，一度出现“以劳代学”的倾向，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提出“大办教育”。当时，增建了板山坪、皇路店两所初中，创建了“南召农校”、“南召师范”、“南召幼师”、“南召商校”、“南召工人技校”和“红专大学”及“县直幼儿园”。至1961年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述学校大部分撤销。1965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半讲半读的中、小学有较快发展。

1966—1976年的“文革”动乱时期，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学校干部和广大教师遭受迫害，教学质量急剧下降。1969年“县革委”根据“侯、王建议”，决定县境所属中、小学的教师下放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一批支山骨干教师被调离南召（县内支山的平原教师，调离山区），给教育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教育战线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开展了“揭、查、批”，推翻“两个估计”，肃清极“左”思潮，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恢复升学考试制度，贯彻“中小学工作条例”，使教学秩序趋于稳定，教学质量日益提高，教育事业步入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轨道。

1991年2月

南召儒学的兴废

张绍欣整理

儒学始于西汉，源远流长。明清在各府、厅、州、县均设有儒学，属于府者称府学，属于厅、州、县者称厅学、州学、县学。

南召儒学在旧县城内西北隅（今云阳镇中心小学校址），开创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修建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清雍正四年（1726年），南召尚隶属南阳县（顺治十六年南召曾属唐县，并入南阳县），知县陈玉绶率众公修东西庑；雍正十二年（1734年）南召复县，知县杨嗣清监修大成殿、戟门；乾隆四年（1739年）知县朱礼陶监修泮池、灵星门、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传道斋、授业斋、启圣祠、文昌祠。

围墙、照壁，乾隆七年（1742年）知县齐贤监修，乾隆八年（1743年）知县包桂监修礼门、义路；乾隆十一年，（1746年）学宫修建完备。光绪十六年（1890年）县城士绅重修文庙时，对照壁作了重新修建，造型宏伟美观，上有二龙戏珠，中有鲤鱼跳龙门，周有花鸟，姿态矫健，栩栩如生，可惜此工艺精湛的照壁却毁于“文革”前夕。

南召从建县起，儒学与孔庙就合为一体，总称学宫，又叫黉学，在学习业的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是县、府童生试录取者。童生试又叫院试，是由省学政每三年两次巡回到各府、州（省辖州）举行的考试。丑、辰、未，成年的考

试为岁科，寅、巳、申、亥年的考试为科考。

清制，凡录取生员的通知发到各县后，知县择定日期，设宴于大堂。届时，新进学的生员，分班参见知县，行四拜礼。

（宴毕，各个披红戴花，击鼓奏乐，由知县领至孔庙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再到明伦堂（学宫的礼堂），先由知县与学官相互一拜，再由新生员向学官行四拜礼，然后向知县和学官辞退。

明清新进学的生员分三种：成绩优秀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可享受官府发给的膳食津贴，在儒学名册上名次居前，可优先被选为岁贡；于正额之外增加名额的叫“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不享受津贴待遇，但廪生缺额可以补入；又额外增取名额，附于诸生末的叫“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不在正式名额。南召每次岁科院试录取的生员，额递数是12名。

儒学设有教官。明时，教谕、训导各一人，清嘉庆后南召只设训导一人。教谕和训导既是儒学的学官和老师，也是一县地方教育长官，并负责孔庙的祭祀，每年仲春、仲秋上旬的丁日为大祭。据史料记载，乾隆七年孔庙的一次祭祀就化费白银40两。祭时，先摆上丰盛的祭品，由知县主祭，学官陪祭，所有生员都参加。仪式主要有上香、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知县宣读祭文和“大清圣谕广训”，同时伴以乐舞。生员在学每逢朔、望日，也要由学官领着祭祀，只是祭品和仪式较为简单。

“圣谕广训”为清帝的诰敕诏令，康熙帝曾公布“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每条加以发挥，故称“圣谕广训”。内容主要是：明伦纪，辨明分，正人心，端风俗”等，以教戒谕

生消除所谓僭越反叛的思想和行为，以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儒学生员在学，每天都由学官“号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学官令其背诵，或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所写“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范围，并从朱注四书中摘取题目课考，以便束缚生员们思想。

儒学的课考有月考、季考、年考，年终总其成绩报于省提督学政（清初称提学道），优者奖，劣者罚。清代后期学政稍宽，生员不要求终日在学习业，学官布置的学业任务，可在家自学，但隔一定时间即把生员召集到学，对其所学内容进行课考，优者奖，劣者罚，以促其学，以备应乡试（乡试在省城试院举行，考中者称为举人）。

清代儒学生员除要求绝对遵守“圣谕广训”外，尚有其他戒律：不准干涉国家政事，不准联盟聚会，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不准诽谤皇帝，不准沾染恶习贻误学业，……违者笞杖或坐牢。

鸦片战争后，列强争相瓜分中国，人们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朝野有志之士，要求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知识，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戊戌变法”后，清廷迫于形势压力，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饬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并颁发“劝学所章程”，饬令各县设劝学所，以改革教育。南召遂遵令废儒学，原训导改为劝学所总董，时李抚宸任总董。宣统三年（1911年）改总董为劝学员长“岁贡出身”的李华升任。

清末兴办学堂之风，很快普及全国，南昌虽系山区

小县，亦在奉令而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首先把试院改为“南召官立高等小学堂。”为适应新型学堂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年底，于高等小学堂内附设“南召官立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又将孔庙黉学改设为“南召官立两等模范小学堂”。自此，为适应封建王朝科举制的南召县儒学，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91年12月

（张绍欣，原系太山庙高中教师，已离休，现任教育志编辑）

忆清末民初南召县教育及人文

刘克明

壹、清末教育概况

一、教育组织：

(一)名称：“教谕”，为清末负责基层教育者。其职位至为超然。盖以受皇帝“诰命”任职，与普通官吏不同。故大官临县，不接不送，而有“大官作道(道台)，小官作教”之谓。

(二)职掌：学田管理(时称山长奖励生员基金)，每届秀才考试，皆由其主持一切考试事宜。平时，对县内所有廪生、贡生、负责考核、辅导、升等之责。每年祭孔大典，“县令”(县知事、县长)主祭，“教谕”主持。另有“训导”一人为其助手，任期各为二年。

二、教育机构设置：

(一)名称：“私塾”。塾者“堂”也。专制时代，无学校之设立，仅由私人“设馆”授徒；或富裕之家，聘请饱学之士教导子弟。而教学地址，通称之为“坐馆”。至于“塾衍为“堂”，乃民初年间大、中、小，皆以“堂”名，可资征也。

(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受聘塾师，除讲解透辟外，尤须文笔高超，适应科场文体制，以备学子参加“科举”考试。

(三)教师来源：教师均为当地、廪生、贡生。凡为人师，无不品学兼优。因此，地位尊崇。由于身教重于言

教，而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之谚。儒家修、齐、治、平传统大道，已隐含其中矣。且为人师者，大都一边执教，一边自修，藉以教学相长，参于科试，步入宦途。故当时于教师，多乐为之。

(四)教育目的：专为培养科举人才，因此，形成“士之子恒为士”，而富商大贾子弟，有志于宦途者，间有寒窗苦读，一举成名者。至如农家子弟，科举一途，甚少参与。故有“农之子恒为农”之说。于此，可知教育之不均等也。

贰、民国初年教育概况

一、教育基层组织：

(一)名称：民国成立，由“教谕”职称演为机构名称，名曰“劝学所”（即以后之科局），其主管为劝学所所长。另助手一至二人，任期两年。德高体健，可连续数任。藉其风范影响下代。

(二)职掌：掌全县公私立学校（堂）人事、教学及考核等等事宜。

二、教学措施：

(一)课程内容：仿照欧美与日本，分文、史、地理、理科等课程，灌输新知识。另加读经、修身、英文等课程。读经一科，在高年级为必修，英文亦然，惟钟点不多。为鼓励向学，沿清制，在前学毕业，选出一人，参加祭孔大典。至民国十三年改制后，始废止。

(二)修业年限：高、初均为四年。初等启蒙，而高等就学学生，已大部分读过四书，且有部分读过经书。故作文一课，能洋洋千百言文章者，大有其人。凡有此表现者，年均在十七八岁，盖当时就读“学堂”风气初开，故学龄较高。

(三) 教学设置：

1、师资：小学堂师资，系秀才曾受简师或师范教育者。
2、学制：有新制与旧制之分，后逐渐改进。以时间言，约自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一阶段；以前称旧制，以后称为新制。新旧不同之处，在于课程增删。再即课文句，分文言与语体。而新制尤著重自然科学为特色。当时设校，未曾普及、县城所在，仅有前、后学两所，乡镇尚少，直至二十三年（1934年），由我创办东关小学，方始有私人兴学之举。

(四) 教育宗旨：针对满清积弱之弊，提出以培育强身、强国、爱国、合群等精神为宗旨。俾青年能成为适应新时代、新潮流之新国民。

(五) 完备时期、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始、迄二十一、二年间，方臻完善。惟此期间，尚有一段过渡期，即“义教”时期（义教乃后来步入国民教育过程）。

(六) 女子教育：民国十年（1921年）间，县城续设女子小学堂。堂长吉晋英先生。但由于社会老观念作梗，招生不易。一期之后，即告停办。然闭塞之风，从此顿开。不独女子地位，因而提高，重男轻女陋习，亦随之大为改变。

叁、清末民初人文略志

一、清代：文教：武备：

首位先贤吴炳南。世居县城东北，村名北召店，村中吴姓居多；有位耕田教书者吴老先生（名字不清），其一子名炳南者，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人称神童。后以“拔贡”朝考得中，即时放于四川巴东“知州”（县知事以上）。约在咸丰年间。后落籍外地。

道光末叶，光绪初年，于教育可资称颂者，城内有张慎诚、小东关有李恒言两位先贤。张氏父子三举人。其子输英、翰屏兄弟同榜。并同时出任“教谕”。一位任职河南归德，一位地址贻忘。后两人均落籍任所。小东关有李恒言先贤，以优贡出任“教谕”（县名不详）。吾幼年随家慈至外祖家拜年（恒言先贤乃吾外曾祖），见堂上祖先牌位上，悬有皇帝颁赠匾额一帧，上书“诰命”二字，并盖御印。在此稍后，小东关又有李氏举人，惟名字不传，仅见居家门前有竖立带斗形旗杆一对，以示举人门第。

同、光年间，城内有经学大师二位：李华先贤（优贡）、道德学养，素本程、朱。故举止言语有其风仪。李公不仅品德高尚，学问渊博，且手笔出类拔萃。时县内凡欲考取秀才，必须经其改课。否则不易。因此，桃李满全县。德望之高，几无与论比。由于家学渊源，其长哲嗣廷祯先生为廪生，民初创立学堂时，即任前学国文教师。因对文学造诣高深，讲书旁征博引，极得学生景慕与尊崇。二哲嗣执教后学，两位皆因后继乏人，于退休之年，久久方罢教。

杨鼎新先贤（贡生），志行高蹈，品学出众，其行谊素为闾里所称道。历届县令，专聘为塾师，教道其子弟。颇受敬仰。但份际谨严，绝不涉及官绅俗务。民初，“教谕”改制为劝学所，为首任所长，其受尊重，可想而知矣。

继述县内曾作“县令”（县知事）者，东关大成号主人，在光绪末年，作过“县令”，邻人多以李大老称之，不直呼其名。于此同时，西关香坊李氏，以拔贡做候补“县令”。

继述名士：城内南大街，一位独立特行之士张文绅先